

从社会文化视角解读水污染问题

孙其昂 河海大学社区研究中心

太湖流域是久负盛名的江南鱼米之乡，也是名闻遐迩的富庶之地。然而，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中，这个秀丽的江南水乡已经不堪重负，陷入了严重的水污染困境。2007年的太湖蓝藻事件，从实践层面回答了巨额资金治理太湖水污染的成效。如今，太湖流域水污染治理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围绕太湖流域水污染问题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具有创建性的著述并不多见。陈阿江的新著《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以下简称《次生焦虑》)首次从社会文化视角对此进行了系统解读，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水污染是一种“社会病”

陈阿江对太湖流域水污染问题的关注已经有15年左右的时间。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水污染事件的频发不但揭示了水污染治理的效果，也促使他思考这样的问题：“太湖流域的水污染为什么边治边污染？为什么久治不愈？”这种现实关怀促使他以扎根田野的精神，从更广的视阈和更长的时间段审视太湖流域的水污染问题。这也促使了这部极富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学术著作《次生焦虑》的诞生。

水污染实质是一种“社会病”。陈阿江对此有精辟的比喻：太湖水污染的问题，与人类的肥胖症相似，也是社会病。如果把太湖流域比作一个人，那么太湖就是胃，流域的河网就是床，肠胃的消化能力基本上是稳定的。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所喂”与“肠胃的消化能力”基本平衡。工业化启动以后，人们给“肠胃”的东西太多，它们消化不了，平衡失调，太湖便开始“肥胖”。

次生焦虑是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

当前，在社会科学中，很多研究者缺乏学术自信，动辄以西方的理论框架分析中国的问题，并力图证实西方理论在中国社会的解释力。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抛弃西方理论。相反，我们需要研究西方理论，但需要清楚地知道西方理论的诞生有其特定的时空背景和社会文化环境，未必适合中国的本土实际，所以直接以西方理论解释本土案例存在很多风险。而《次生焦虑》不但没有套用西方理论，而且在经验研究基础上建构了富有本土特色、能够解释中国社会的学术概念和理论框架。这关乎本土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也是对当前中国社会学界呼唤“理论自觉”的最好回应。

在《次生焦虑》中，作者用“利益相关者”视角，分析水污染事件中主要利益相关主体力量失衡所造成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用“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分离，解释法律形同虚设致使水污染“一泻千里”的问题；用从“外源污染”到“内生污染”，解释水污染的社会文化逻辑乃至从“环境污染”到“精神污染”的社会病理；用“运动范式治水”、“技术范式治水”和“地方主义范式治水”，批判当前的水污染治理思路。作者从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揭示包括水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为此，作者回到了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精辟论述中，并将新教徒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在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强烈的紧张和焦虑称为“原生焦虑”，而将中国在追赶现代化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性焦虑称为“次生焦虑”。他指出，中国社会的次生焦虑是中国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

10年治污天方夜谭治理泰晤士河花150年

《次生焦虑》旨在解决“水污染中的科学认知问题”，事实上也向我们提供了治污良策。作者看来，治污就如同治病，“情况不清，处方无效，治理效果可想而知”。所以，作者希望首先能从社会文化视角解释水污染问题。“从源头上讲，污染是因为人的不当行动产生的。”所以，“技

术治污必须纳入到社会治理的框架内”，他同时指出：太湖流域的水污染治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全民共同努力，并存有耐心，不能一蹴而就。

但是，在水污染治理中，我们已经处于“焦虑”的状态中。一方面，社会公众期待着“清水碧波”早日再现，这也反映了公众对水污染治理成效的严重不满。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焦虑”心态更为明显。1990年代以来，政府部门纷纷提出“2000年底实现淮河水变清”、“2000年实现太湖水变清”等宏伟目标。事实证明，只是文山会海地宣传而并不是真正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只会造成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当前，有些地方提出“用10年时间从根本上解决太湖水污染问题”的口号。殊不知，太湖水污染涉及生态系统问题，一旦系统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其修复和治理需要更长的时间。比如，英国泰晤士河治理前后花了150年的时间。“10年时间根治太湖”的口号，既是漠视生态规律的行为，更是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在作祟，无益于从根本上解决水污染问题。水污染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要有大量资金投入，也需要民力民心投入；不仅需要环境技术，更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同时还需要文化调适。政府若把各方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合力，才有希望。